

DOI: 10.3969/j.issn.1674-9391.2023.01.013

民国时期的边文教材 与藏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培育

励 轩

摘要 教科书是链接国家、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纽带,是塑造共同认同的有力工具。南京国民政府较为重视边文教材的编译与使用,希冀借此推进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建设。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下设的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编译了一套《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试图分别从政治、民族、历史、文化四个方面入手,对藏族学生的国家意识进行塑造。边文教材的编者考虑到了藏族学生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地编译教材内容,同时非常注重在编译中加入乡土元素,也很注意内外有别的问题,这些都有助于藏族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虽然编译边文教材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进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工程,但由于当时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加之国民党深陷内战,无暇顾及边疆教育等客观因素,该套教材最终并没有大规模和持续性地对藏族社会产生影响。

关键词 边文教材; 藏族; 中华民族; 国家意识; 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23)01-0112-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近代东部藏区商业贸易中藏族与各民族的交流交往研究”(20VMZ005)、四川省2021年—2023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育教学的研究与实践”(JG2021-98)阶段性成果,并获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励轩,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边疆民族问题。四川 成都 61006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将印刷资本主义视为国家/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形成的关键。^[1] 教科书则是印刷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链接国家、知识精英及社会大众的纽带,教科书对塑造国民的国家观、民族观具有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政府利用国民教育通过教科书进行民族主义思想洗礼,可以最为有效地动员社会大众,并最终形成一致化的国家观、民族观。学界早就认识到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对形成与巩固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并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1] 但以往的成果主

要依赖汉文教材和材料进行研究,而对于供少数民族学生使用的边疆民族语文教材(边文教材)内容几乎没有涉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清末民国时期编译的边文教材本就稀少,流传下来的就更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界研究当时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塑造。本文以笔者收藏的一套极为稀缺的《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2] 为中心,剖析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利用边文教材促进藏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形成,从而弥补以往相关研究未能对边文教材具体内容进行分析的不足。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分析,文章展现了南京

国民政府通过边文教材全方位、多角度地塑造藏族学生的国家意识,以使他们成为具有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现代国民。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文教材编译

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边文教材编译的具体规划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教育部公布的《实施蒙藏教育计划》。根据该计划,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会根据三民主义原则,按照蒙藏各自的情形,编印蒙藏文和藏汉文合璧的各级学校教科书以及其他辅助性的民众读物。具体办法有三条“甲、由教育部编审处聘请精通汉蒙文和汉藏文而又熟悉蒙藏情形的人员,以内地中小学现用的教材为蓝本,积极编译蒙藏中等以下学校的课本和补充读物;乙、由教育部奖励编译蒙藏文中小学应用的教材和民众读物,送部审定;丙、教育部译印的和审定的中小学教材及民众读物,应设法鼓励书店印行。”^[1]

从1932年起,教育部陆续编印边文教材,至1935年完成汉蒙、汉藏、汉回合璧小学国语课本各8册,常识课本各4册,民校本各2册,短期小学课本各4册。^[2]这些教科书编完后,送至各边省学校,连同民间自行编印的读物,一起供边疆民族地区学生使用。但这些边文教材的编译质量可能并不高,与其他内地教材在边地的使用效果引起了一些争议,当时熟悉西康省教育问题的阳昌伯就著文抱怨说“内地所编制各科教科书,每不与边地实情季节相合;而坊间所出版书籍,缺乏普遍性,大部分不能适应于边地,故教学发生种种困难,最显著者:(一)教材不能引起儿童兴味;(二)教材不适合于边疆人民生活社会实情;(三)教材不能循年度而教授完备;(四)教材缺乏。”^[3]教育部的边疆教育专家郭莲峰在1940年也著文检讨边疆教材问题,批评这些教材在边地学校的适用性“上海各书局编的教科书,拿到西北、西南各省,内容适用的实在很少……教育部虽然编了几部汉蒙汉藏汉回合璧小学教科书,国立编译馆也在奉命赶编边地小学国语教科书,我以为这都是闭门造车的工作……”^[4]教育部后来在1940年公布的文件中承认现行边疆教材和读物太少且不符合边地实际情况,并提出重新编译一些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教材,以提升边校教学质量。^[5]

但抗战时期,各方面条件都欠缺,边文印刷设备在抗战初期就已全毁,编译工作也早已停顿下来,是故教育部只在1943年找了一些简陋的边文印刷设备,匆忙译印了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蒙藏回文各一套(回文本并未出全)。^[6]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重新编译边文教材才被提上日程。1945年,国民政府筹设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根据1946年6月公布的《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组织条例》,该馆“主要任务为掌理边疆文化教育之研究及发展事宜,内设研究、编译、文物三组。”首任馆长由教育部委任边疆教育司司长凌纯声担任。^[7]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甫一成立,便着手编印边疆初等教育教材,该套教材以国定本初级小学国语常识教科书作为蓝本,再分区插编乡土内容,译成蒙、藏、维吾尔文。^[8]《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以下简称《常识课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编印出来的。

《常识课本》共八册,根据该套教材封二提供的《编辑要旨》,编译该教材的目的是为“普及藏族教育”。考虑到民族教育的具体情况,编译者非常注重在教材内容中加入乡土元素,所以“除选译国定本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文外,另插编了乡土教材,”并且编译者在第一册中加入了藏文字母及拼音练习内容。编译者甚至注意到了课本内的插图,规定“本书插图关于乡土教材部分,均以藏族社会为背景,并于学童之服装,参以改良之形式。”可以看出,编译者是有意要将该套课本做成汉藏双语的。在教材的应用方面,编译者提出应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凡学生愿学藏文者,授以藏文。愿学国文者,授以国文。愿兼学两种语文者,其一种得酌加时数或于课外辅导学习之。”^[9]

该套教材的编译者主要由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民族学家以及兼通藏汉文化的知识分子构成,编译委员会主任由凌纯声兼任。凌纯声对边疆民族的教育问题应该是相当了解的,他早年在巴黎大学学习民族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即回国进入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主持参与了一系列民族调查,^[10]由于他对中国民族学的杰出贡献,有学者将凌纯声称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1]凌纯声作为编译委员会主任,主要负责教材编译工作大方向的把握,具

第一,强化对共同政治的认同。《常识课本》从第五册开始大量加入有关中国政治的内容。其中第一部分是宣传政治领袖及其思想,主要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孙中山在课本中是以国父的形象展示出来的,“国父”的藏文直译成了 རྒྱལ་ཁབ་ཡབ 或 རྒྱལ་ཡབ,即国家之父亲。编译者想给藏族学生造成一种印象,孙中山是包括藏人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国父。通过对孙中山功绩(མཛད་པ)的介绍,编译者就把国民革命(རྒྱལ་ཁབ་མི་མེར་གྱི་གསར་བཞེ) 、三民主义(མི་མེར་གྱི་རིང་ལུག་གསུམ) 、中华民国(ཡུང་ནྟ་མི་མེར་རྒྱལ་ཁབ) 、建国大纲(རྒྱལ་ཁབ་འཛུགས་ཁྱེད་མཛོད) 这些术语灌输给了学生。^[9] 在第七册,编译者又进一步介绍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的内容以及国民革命的经过。^[10] 之后,编译者还在第八册更为详细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经历^[11]。《常识课本》对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的介绍,看起来是为了贯彻南京国民政府所确立的按照三民主义实施教育的原则,^[12] 从孙中山这个政治人物入手,进而谈及他的政治思想是更容易让小学生接受的一种方式。第二部分则为灌输政治符号,涉及国号、国家地理等。《常识课本》第五册开始出现这些政治符号,其中第一个词是“中华”,藏文用的是音译 ཡུང་ནྟ་。由于该词不是藏语原来就有的,为了加深藏族学生对中华的理解,编译者还用汉藏双语解释该词的意思,汉语用“我同胞的老家”,藏语用 འཛོམས་སྤྱན་གྱི་པ་ལྗམ 或 འཛོམས་སྤྱན་གྱི་པ་ཡུལ,即“我们兄弟的故土”。^[13] 《常识课本》第六册介绍了首都(འཛོམས་སྤྱན་གྱི་པ་ཡུལ) 和陪都(རྒྱལ་ས་གཉིས་པ),并重点对首都南京的名胜包括莫愁湖、玄武湖、雨花台、中山陵等进行了介绍,以增进学生对首都的直观认识。为强调首都和陪都是藏族学生自己的,编译者分别用汉文和藏文予以强调,汉文用“我们的首都和陪都”,藏文用 རང་རིེ་རྒྱལ་ཁབ་གྱི་རྒྱལ་ས་ཆེ་བ་དང་རྒྱལ་ས་གཉིས་པ,即“我们自己国家的首都和陪都”。值得注意的是,当提到陪都时,汉文版出现了四个,即重庆、西京、洛阳、北平,而藏文版则只有三个,省去了北平,^[14] 可见《常识课本》虽是双语,但并非完全——对应翻译,甚至会有错漏。《常识课本》第七册对国家地理做了进一

步详细的介绍,包括对中华民国行政区划、重要城市、重要海港的介绍,^{[2] 48-60}以加强藏族学生对国家版图的认识。第三部分是宣扬国家自豪感。宣扬国家的伟大是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巩固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常识课本》就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在论及“中华”(ཡུང་རྫོང་),编译者颂扬了它的人多、地广、气候适宜、物产丰饶,并给学生灌输它“有全世界最长久的历史,有全世界最发达的文化”,藏文部分则进行逐字逐句翻译,མི་འཕྲོད་མང་པོས་ཁྱེད་ཆེན་པོ་ནི་ཕྱི་རྒྱལ་གྱི་ཆེན་པོ་ལྟ་བུ་ཡིན་པའི་འཕྲིན་ལོན་ལས། (རང་ཅག་མི་དེ་ངོ་མཆོད་མ་གྲུབ་དུ་མི་རྒྱུད་ཀྱི་ཆེན་པོ་ལྟ་བུ་ཡིན་པའི་འཕྲིན་ལོན་ལས།),“要使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民族”(རང་ཅག་ཡུང་རྫོང་གི་རྒྱུད་འདི་བཞིན་འཛམ་གླིང་གི་མི་རྒྱུད་ཀྱི་དཔལ་ལས་ཁོང་ལྷན་ཁང་དང་པོར་མོན་པ་བྱུང་གོ།)。^{[2] 43-46}为了论证汉藏同属中华民族以及双方自古以来就有血缘上的联系,《常识课本》第七册有一篇课文专门讲了“汉藏的融合”(བྱ་བྲོད་གཉིས་ཀྱི་མཐུན་འབྲེལ།),提出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成婚以及后者把汉文化带入藏地,意味着“汉藏从此发生了血统的关系和文化的交流”(དེ་ནས་བརྒྱུད་བྱ་བྲོད་གཉིས་ཀྱི་གཞུག་གི་འབྲེལ་བ་དང་རིག་གཞུང་བྱུང་བྱུང་འབྲེལ།)。^{[2] 9-11}编译者在谈及汉藏融合时,藏文词汇的运用方面也是值得一提的,他们在翻译“汉”时,用的是བྱ་,“内地”则是བྱ་ནག་,翻译唐朝的“中国”也是བྱ་ནག་,而非当时“中国”的音译ཡུང་གོ་,这样就把唐朝时期的中国 and 现代中国做了区分,不至于在藏文理解上引起误解。另外,我们也需要关注,在《常识课本》的汉文版中,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是被矮化为宗族的,这与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族论一致。^[4]但在藏文版中,“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和藏族等宗族均是被翻译成བྱ་རྒྱུད་,该词直译过来是“民裔”。所以,当《常识课本》汉文版中提到“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藏文版中说的却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བྱུས་ཁབ་ནང་གི་མི་རྒྱུད་ཐམས་ཅད་ལྷན་གཅིག་ཏུ་འདྲ་མཉམ་པ།)。^{[2] 24-26}教材的编译者可能是意识到“宗族”一词对各族人民的矮化含义,利用了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民族话语体系的松动,^[2]在藏文版本中予以矫正。

在谈及中华民国时,也是用了大量溢美之词,“河山壮丽,湖海汪洋,领袖东亚,泱泱大邦”(藏文:རི་རྒྱ་གཟི་བཞིན་དཀྱིལ་མཆོད་རབ་རྒྱས།ཨ་ཤར་གཙོ་འཛིན།དབལ་ཆེན་རྒྱལ་ཁབ།)最后一部分则是介绍政治制度。《常识课本》第七册对五院制国民政府的架构进行了说明,^{[2] 71}为了增进学生对政府的认同感,还用拟人方式,将政府的形象具体化为政府官员、警察、士兵,并以极为正面的方式进行叙事。比如,《常识课本》第七册有一篇课文《我们都信任你》(藏文:ང་ཆོ་ཆོང་མས་ཁྱེད་ལ་ཡིད་ཆེས་ལྷོས་འགྲུལ།),借用国民政府任职的叔父之口把国家、人民与政府官员比作汽车、汽车主人与司机,提出“车子要开到什么地方,我们要听主人的吩咐,开车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主人才能信任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尽职,主人可以随时调换别人来开车。”^{[2] 72-75}而代表人民的“大家”则纷纷对代表政府的叔父表示:“我们都信任你。”

第二,培育统一的民族认同。《常识课本》汉文版中所说的民族通常是指“中华民族”(ཡུང་རྫོང་གི་རྒྱུད་),而整套教材主要想强化的民族观也是对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常识课本》的编译者有意识地教导藏族学生大家同属一个中华民族的理念,并且努力使这些学生以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而感到自豪。在《常识课本》第七册的一篇课文里,编译者借他人之口进行问答:“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究竟是那(原文:那,编辑校正为:哪)一个民族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ཡང་ཞིང་འཛམ་གླིང་འདིར་མི་རྒྱུད་ཆུ་ཆེ་ཤོས་ལུ་རེད་ཅེ་ན།རང་ཅག་ཡུང་རྫོང་གི་རྒྱུད་ཡིན་ཅིང་།)。^{[2] 42-45}接着又说中华民族的人口世界最多,进而推导出中华民族的力量伟大“假使这许多人一齐去筑公路,照一千五百人每天筑一公里计算,四亿人一天就可

以筑二十六万多公里。国父所计划兴筑的全国公路一百六十万公里,只要六天就可以完成。诸位想:这力量够多么伟大啊!”最后,课文不忘提醒藏族学生“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རང་ཅག་མི་དེ་ངོ་མཆོད་མ་གྲུབ་དུ་མི་རྒྱུད་ཀྱི་ཆེན་པོ་ལྟ་བུ་ཡིན་པའི་འཕྲིན་ལོན་ལས།),“要使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民族”(རང་ཅག་ཡུང་རྫོང་གི་རྒྱུད་འདི་བཞིན་འཛམ་གླིང་གི་མི་རྒྱུད་ཀྱི་དཔལ་ལས་ཁོང་ལྷན་ཁང་དང་པོར་མོན་པ་བྱུང་གོ།)。^{[2] 43-46}为了论证汉藏同属中华民族以及双方自古以来就有血缘上的联系,《常识课本》第七册有一篇课文专门讲了“汉藏的融合”(བྱ་བྲོད་གཉིས་ཀྱི་མཐུན་འབྲེལ།),提出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成婚以及后者把汉文化带入藏地,意味着“汉藏从此发生了血统的关系和文化的交流”(དེ་ནས་བརྒྱུད་བྱ་བྲོད་གཉིས་ཀྱི་གཞུག་གི་འབྲེལ་བ་དང་རིག་གཞུང་བྱུང་བྱུང་འབྲེལ།)。^{[2] 9-11}编译者在谈及汉藏融合时,藏文词汇的运用方面也是值得一提的,他们在翻译“汉”时,用的是བྱ་,“内地”则是བྱ་ནག་,翻译唐朝的“中国”也是བྱ་ནག་,而非当时“中国”的音译ཡུང་གོ་,这样就把唐朝时期的中国 and 现代中国做了区分,不至于在藏文理解上引起误解。另外,我们也需要关注,在《常识课本》的汉文版中,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是被矮化为宗族的,这与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族论一致。^[4]但在藏文版中,“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和藏族等宗族均是被翻译成བྱ་རྒྱུད་,该词直译过来是“民裔”。所以,当《常识课本》汉文版中提到“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藏文版中说的却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བྱུས་ཁབ་ནང་གི་མི་རྒྱུད་ཐམས་ཅད་ལྷན་གཅིག་ཏུ་འདྲ་མཉམ་པ།)。^{[2] 24-26}教材的编译者可能是意识到“宗族”一词对各族人民的矮化含义,利用了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民族话语体系的松动,^[2]在藏文版本中予以矫正。

第三,塑造共同的历史认同。《常识课本》在涉及到历史部分,是将之纳入到整个中国历史范畴的,按照时间线,以人物为中心,从远古神话时代一直穿插到近现代。历史部分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是黄帝(ཡུ་ཏི་ཉི་ཨོ་),编译者先列出黄帝的几个功绩“统一部落、建立国家、创建房屋衣裳农具、发明指南车”,^{[2] 79}再讲述黄帝发明指南针的故事,以加强藏族学生对这位神话历史人物的认识。《常识课本》关于历史的叙事基本沿用这一模式,当然也有些历史人物不会单列一个功绩表出来。按照这一模式《常识课本》先后讲述了黄帝、嫫祖、尧、舜、禹、弦高、孔子、秦始皇、

汉武帝、张骞、班超、祖逖、唐太宗、弃宗弄赞、文成公主、岳飞、元太祖、拔都、邓世昌等人物,涉及到了上古时期、春秋、战国、秦、汉、晋、唐、宋、元、清等时期与朝代,使得藏族学生对中国历史的脉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为了突出这个历史也是藏族学生自己的历史,编译者非常重视使用我国(རང་འབྲེན་རྒྱལ་ཁབ་)一词,比如说到大禹治水时说“我国上古时代”(རང་འབྲེན་རྒྱལ་ཁབ་ཐོག་མའི་དུས་ལ་) [23]。编译者也很懂得在讲述历史故事时激发藏族学生热爱国家和民族的感情,比如谈到班超时,以班超之口说出作为文弱书生的“我”,“一定要替国家做些事情,为民族争些光荣”(ཁོ་ཚོས་ངེས་པར་རྒྱལ་ཁབ་ལ་བྱ་བ་འགའ་ཞིག་བྱས་ནས་མི་རྒྱུད་ཀྱི་མགོ་འཕང་གཞི་བཞིན་ཚོད་རྒྱུ་བྱེད་ཀྱི་ཡིན།) [24] 4-8 但略显遗憾的是,《常识课本》的编译者似乎较少参考传统藏族史家撰写的历史文献,所以对于传统藏族史家重点叙述的藏族地方史基本是忽略的。另外,教材中提到的藏族与其他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交流交往交融部分相比于丰富的史料来说,还是略显少,全套《常识课本》只择取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通婚,而对于元明清以来多姿多彩的交流交往交融史则几乎没有涉及。

第四,增进包容性的文化认同。中华文化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丰富多样、博大精深。《常识课本》编译者很注意使藏族学生对中华文化最精华的部分有初步认识。比如,《常识课本》第八册有一篇课文讲《我国的瓷器》(རང་འབྲེན་རྒྱལ་ཁབ་ཀྱི་དཀར་ལྗལ་),点出了我国在世界上很著名的物产,包括丝(ཟུང་)、茶(ཇུ་)和瓷器,并对瓷器的产生和产地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25] 26-29 好让学生有基本印象。编译者很懂得处理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将中华文化塑造成包括藏文化的集合体。《常识课本》第六册有一篇课文专门介绍了“西藏的文字”(བོད་ཀྱི་ཡི་གེ),解释了藏文的来龙去脉。同时,为了凸显藏文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还将之归在《我国的文字》(རང་འབྲེན་རྒྱལ་ཁབ་ཀྱི་ཡི་གེ)栏目中。 [23] 12-15 编译者也有意识地向学生介绍了藏族的传统文化,比如有一篇课文叫《西藏人赛马》(བོད་པ་ལ་རྩ་རྒྱུགས་),详细谈了藏族传统的赛马活动。 [26] 62-64 编译者对中华文化与藏文化关系的处理,应该是在贯彻朱家骅、凌纯声等人提倡的“先认识本族,爱护本族,进而了解国族,爱护国族” [27] 的精神,希望通过让藏族

学生了解本族文化,进而爱护本族文化,同时也让藏族学生更全面地体认中华文化,进而爱护中华文化。

三、边文教材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进一步研究与分析《常识课本》每一册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编译者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是比较符合普遍的教学规律,另一方面也兼顾到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这些特点大致如下:

第一,循序渐进。编译者考虑到了藏族学生的接受能力,所以《常识课本》全八册,都是遵循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来逐册编译的。第一册主要讲藏文的拼音字母和拼读法。第二册到第四册则主要介绍学校生活以及简单的衣食住行内容。从第五册开始,才逐步添加稍难理解的政治性内容,并在之后几册加重比例。编译者这种安排是比较符合学生教学规律的,低年级学生更容易理解日常可以接触到的教学内容,而像国家意识这样的抽象内容,放在高年级进行教学更为合适。

第二,注重乡土元素。在编译边文教材时要考虑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是当时教育部奉行的精神,凌纯声就说编写这套边文教材时,“仍就(原文:就,编辑校正为:旧)国定本小学国常课本,分区插编地方性民族学教材,课文插图,亦以边地事物为主,使边生易于辨识。” [28]

《常识课本》编译者遵循了教育部这一方针,因此我们可以在这套教材中发现大量乡土元素。比如内地小学课本中虚构型人物角色常用的汉名换成了藏名,像札喜(པ་ཤེས་)、达华(ཐའ་བ་)等。又比如《常识课本》第三册有一篇课文《做酥油》(མར་བཟོ་བ་),专门讲了藏族人民生活离不开的酥油及其制作过程 [24] ,这在内地的小学教材中是不会出现的。

第三,注意内外有别。边文教材中有一个不好处理的地方就是如何定位民族英雄,而《常识课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处理民族英雄问题的范例。编译者遵循的原则就是内外有别,现代中国历史上内部纷争中涌现的英雄就不称为民族英雄,只有抵御现代中国的外敌过程中产生的英雄才被称为民族英雄。《常识课本》中涉及的两个历史人物——岳飞和邓世昌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对岳飞的描

述中,编译者称赞了他的个人事迹,包括抵抗金人、打败金兵、收复失地等,并讲了他大破金人拐子马的故事,把他塑造成一位英雄人物。文章中,编译者用敌人(དཔལ་ལོན་)来形容金人(ཅིན་པ་)或金兵(ཅིན་ཕྱི་དམག་དངུང་),但自始至终,编译者也没将岳飞称为民族英雄。^[12-14]而在讲述邓世昌的课文中,作为中日甲午海战我方的主要将领,编译者将他称为“海上的民族英雄”(མཚོ་ཐོག་མི་མེད་རིགས་རྒྱུད་ཀྱི་དཔལ་ལོན་)。^[15] 81-93

尽管《常识课本》的编译存在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这套教材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套教材存在的第一个大问题是翻译还有瑕疵。《常识课本》的编译者中虽然有几位精通汉藏双语,但在一些字词翻译上还是存在瑕疵。第五册第一篇课文中的“推翻满清政府”,藏文写的是སྐྱེལ་རྒྱུད་དྲིན་ཕྱག་རྒྱུ་བསྐྱོད་པ་མཛད།藏文翻译过来应该是“驱除鞑虏”的意思。而“鞑虏”(སྐྱེལ་རྒྱུད་)两个字的藏文用得也不恰当,སྐྱེལ་是蒙古之意,རྒྱུད་是后代之意,合起来是“蒙古后代”,跟满清是没有太大关系的。^[16] 1-3 又比如《常识课本》中的སྐད་པ་(藏人)的汉文译法,编译者将其译成了“西藏人”,但སྐད་པ་(藏人)实际上并不是只有西藏人。再比如,《常识课本》关于西藏的藏文译法出现了两个,一个是用སྐད་(藏地),另一个则是汉字的藏文拼音ཤིའི་གཙང་,^[17] 61-64 编译者却没有很好地界定两个藏文“西藏”的区别。另外,这套教材部分内容存在着叙述不自洽的问题。《常识课本》中,指称现代中国的通常是汉语音译的ཡུང་ལོ་,ཐུན་ལོ་(内地)一词间或用来指称古代中原王朝国家。但在论述秦始皇的功绩“统一中国”时,编译者却用了ཡུང་ལོ་而非ཐུན་ལོ་,^[18] 35-35 这就容易使藏族学生造成混乱,秦始皇所统一的到底是中原呢,还是包括涉藏地区在内的现代中国?当然,这套教材出现以上问题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部分翻译上的瑕疵以及叙述上的不自洽可能跟编译时间太短有关,这套全八册《常识课本》的整个编译、出版周期不到一年,编译者难免还是会有各种疏漏。

四、边疆教育、边文教材与国家认同建设的调整

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选择性地继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遗产,长期以来在实践中更加强调民族同化思想,主

张建立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19]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也一度影响了边疆教育。抗战期间,教育部就有官员主张在边疆教育中弱化民族语文,用注音符号用来表注民族语言,以求加快实现国语普及,如郭峰莲就说“现有边地通行的文字,计蒙文、藏文、回文、彝文、么些文、僣文等数种,这都是固有的文字,还有外国教士用拉丁文所创的苗文等多种,回文与僣文通行较广,蒙文多王公贵族用之,藏文寺庙及西藏政府用之,其余都是僧侣巫师所用,一般民众均不通晓。所以过去所编汉、蒙、藏、回文合璧教科书是否适用,边疆是否应该逐渐推行国语教育,以达到国语之统一,这是边教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教育部现正设法扩充注音符号用来注边地方言,以为统一国语的津梁。”^[20] 曹树勋也著文论述利用国文统一边地文字之必要,甚至认为:“如有适当之教材与熟练之教师,直接教以国文。”^[21]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在国家认同建设上受到了来自党内外的压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批评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另一方面,国民党党内的少数民族精英也在要求改变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设理念。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调整了国家认同建设的方向。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没有提及中华民族宗族论,大会宣言关于民族主义的表述也重新回到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精神“民族主义之目的,一曰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为贯彻民族主义之目的,本大会特重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于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之宣言,必以全力解除边疆各民族所受日寇劫持之痛苦,亦必以全力扶助边疆各族经济、文化之发展,尊重其固有之语言、宗教与习惯,并赋予外蒙、西藏以高度自治之权。”^[22] 在1946年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内各民族的民族地位再次得到了肯定,出现了“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23] 这样的表述。可以说,国民党此时的国家认同建设已经在朝向多元一体的方向发生变化。

在国民党关于国家认同建设主张发生变化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高官对边疆教育抑或民族教育也一再出现更为包容与开放的发

声。在1946年12月召开的边疆教育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上,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对边疆学校语文教学问题作了一些解释,指出社会上一般人认为中央为了同化边疆民族而规定学生非读国语不可是一种误解,提出“我们认为国语要学,各民族语文也可以学。”^[69]不久,他还在一个序文中讨论了民族教育“民族教育,为使民族观念扩张广大,成为国族意识之重要媒介。国族意识,必须以民族观念为基础,此与国父所示世界主义必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其理正同。”^[70]在这里,朱家骅所用的“民族”一词其实是中华民族宗族论中的“宗族”,而“国族”则是指中华民族。朱家骅对“民族观念”与“国族意识”的认识较为积极,认为二者并非互斥,而是相辅相成,故而提出民族教育要坚持两个方针:“一方面必须尊重边地各族之历史传统,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尚习俗,以及一切文化生活方式,并择其善者发扬之,择其不善者改进之,使各族之青年学子,首先了解本族,爱护本族;另一方面,为防止单纯的民族观念可能发生之流弊,使其放大眼光,扩张胸襟,体认国族之伟大,进而爱护国族。”^[71]

朱家骅对边疆教育抑或民族教育的开放态度,对当时教育部的边文教材编译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原来主张用国文统一边地文字的曹树勋此时就撰文提出民族语文与国文应该并行不悖,在教材编译方面也应考虑双语教育的需要,他说“吾人认为边文与国文同为介绍教材内容之工具,可以并行不悖,故学生愿学国文用国文课本抑愿学边文用边文课本,悉听其自由选择,不加限制。至于教材方面,不仅内地标准,不合边地情形,即蒙与藏,藏与回,回与蒙之间,亦相互悬殊。故边地教材,理想办法为分区编著,而后分译各该区边文。分区编著可以乡土资料为核心,渐次介绍全国一致性之教材,务使边地学生,先养成纯正的爱乡观念,而后扩充光大,发为爱国爱民族之热心。”^[72]时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凌纯声也支持编译具有乡土元素的小学边文教材,同时在具体使用方面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权,^[73]并主持了抗战胜利后边文教材的编译工作,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该次边文教材编译的质量。

编译边文教材无疑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

继续推进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工程,得到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一众高官的支持,但我们不应高估其收到的实际效果。尽管《常识课本》的编译质量相较前两次的边文教材要高,特别是在适用性方面应是大大提高了。但就涉及到身份认同的内容来说,汉文版和藏文版仍存在矛盾,藏文版采用了国民党六大关于民族主义的表述,突出的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汉文版则仍受到中华民族宗族论的影响,以“宗族”一词指称国内各民族,这种内容上的矛盾自然会给学生带来思想上的一些混乱。此外,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能力较弱,以涉藏地区为例,西藏当时由西藏地方的噶厦政府控制,西康、青海、云南、甘肃等地涉藏地区均在军阀或当地土司掌控之中,中央政府基本上处于鞭长莫及的状态,要想推进边疆教育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1946年统计,当时国立各边校仅有61所,其中小学34所、中学2所、专科学校3所、职校8所、师范学校14所,共计学生9611名。^[74]教育部虽想在边疆民族地区普设边校,^[75]但限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且之后国共内战爆发,这一目标已是很难完成。边疆民族地区学校数量有限、生员人数较少的状况,大大影响了边文教材的印刷和使用情况,汉藏合璧的《常识课本》前半部只印了两千套供各边地学校使用。^[76]随着两年后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该套教材也停止了使用,没有大规模和持续性地对藏族社会产生影响。

五、结语

通过研究与分析这套教材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边疆教育有一个更为深入、细致与直观的了解。总的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借助边文教材编译全方位、多角度地对藏族学生进行国家意识的塑造,希冀使他们能够从精神层面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同时,我们也有其他重要的发现,比如《常识课本》编译者对乡土元素极为重视,全套教材有大量地方性民族性内容,以使藏族学生更容易接受与理解。《常识课本》的编译与使用有助于藏族学生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教育积极的一面。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边疆教

育并未得到真正普及,所以这些教材所起的作用也比较有限,尤其是这些教材印量较少且使用时间非常短暂,很难对藏族社会形成大规模和持续性的影响。

注释:

①参见刘超《民族主义与中国历史书写——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孙江《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载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孝迁《“制造国民”:晚清历史教科书的政治诉求》,《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2期;于逢春《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

②该教材印量可能仅有两千套,迄今为止笔者只发现这一套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③王海文《教育制度与国家转型——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政策及实践研究(1927—1949)》,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9:第90页。转引自郭寄嶠《民国以来中央对蒙藏的施政》,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48—49页。

④蒋介石《视察青海西宁演讲:中华民族整个的责任——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户、千户讲》,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215页;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台北:中正书局,1986,第2页。

⑤朱家骅《代序》,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边疆教育概况(续编)》,1947年,第2页;凌纯声《战后两年来的中国边疆教育》,《中华教育界》,1948年复刊2第1期,第48页。

参考文献:

- [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M]. London: Verso, 2006: 37.
- [2] 实施蒙藏教育计划 [J]. 教育部公报. 1930,2(14):9.
- [3] 王海文. 教育制度与国家转型——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政策及实践研究

(1927—1949) [D].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2019:36.

[4] 阳昌伯. 西康教育设施刍议 [J]. 康藏前锋,1936,3(11):9.

[5] 郭莲峰. 边疆教育工作之检讨 [J]. 教与学,1940,5(07):26.

[6]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 边疆教育概况 [M]. 重庆: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印,1943:224.

[7] 曹树勋. 抗战十年来中国的边疆教育 [J]. 中华教育界,1947,复刊1(01):64.

[8] 教育与文化: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正式成立 [J]. 教育通讯,1948(10):31.

[9]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 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第二册) [M]. 教育部印行,1947:封二.

[10] 耿雯. 凌纯声与现代中国民族学 [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6—11.

[11] 娄贵品. 论凌纯声的边政改革主张与边疆建设贡献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49.

[12] 刘波. 民国刘家驹的康藏研究及其价值——以氏著《康藏》为中心 [J].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2013(六):132—133.

[13] 王佩龙,忒莫勒. 边疆学学者黄奋生及其著作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04):97—100.

[14] 民国政府教育编纂委员会.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1236.

[15] 凌纯声. 战后两年来的中国边疆教育 [J]. 中华教育界,1948,复刊2(01):51—52.

[16] 凌民复. 建设西南边疆的重要 [J]. 西南边疆,1938(02):6.

[17] 汪洪亮. 国族建构语境下国人对边疆地区多元文化及教育方略的认识——侧重20世纪30—40年代的西南地区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4):61.

[18]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 边疆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 [G]. 1941:1.

[19]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 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第五册) [M]. 教育部印行,1947:1—3.

[20]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 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第七册) [M]. 教育部

印行,1947:24-37.

[1]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 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第八册) [M]. 教育部印行,1947:60-64.

[2] 励轩. 超越民族国家——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建设 [J]. 思想战线,2022(04):56.

[3]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 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第六册) [M]. 教育部印行,1947:30-32.

[4]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 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第三册) [M]. 教育部印行,1947:19-20.

[5] 励轩.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精英关于中华民族建设问题的讨论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2):20.

[6] 曹树勋. 边疆教育新论 [M]. 正中书局,1945:102.

[7] 荣孟源. 第六次全代表大会宣言(1945

年5月21日) [C]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社,1985:911.

[8] 中华民国宪法 [J]. 政声月刊,1947(渝版4):18.

[9] 朱家骅. 主席朱部长致开幕词 [C] //边疆教育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报告. 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编,1947:4.

[10] 朱家骅. 代序 [M].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 边疆教育概况(续编),1947:2.

[11] 教育部. 边疆教育 [M]. 南京:行政院新闻局,1946:4.

[12] 凌纯声. 凌司长报告边疆教育实施概况 [R]. 边疆教育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报告,1947:7.

收稿日期:2022-10-30 责任编辑:王珏

Bilingual Textbook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Border 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mong Tibetan Stud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Xuan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ichuan, China)

JOURNAL OF ETHNOLOGY, VOL. 14, NO. 1, 112 – 120, 2023 (CN51 – 1731/C, in Chinese)

DOI: 10.3969/j.issn.1674 – 9391.2023.1.013

Abstract: Textbook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they provide a link between the state, the intellectual elite, and the public. To mobilize society and create a coheren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government can use education to spread national ideology through textbooks. Therefore, bilingual textbooks can be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better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border areas. In 1930,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began planning for the compilation of bilingual textbooks. Several large-scale compilation activities of bilingual school texts were conducted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se bilingual books were printed in small quantities, and most of them have got scattered or lost. Only one set named *General Knowledge in Chinese and Tibetan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Eight Volum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General Knowledge*), published in 1947, has been considered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well preserved. These textbooks were compiled by ethnologists with good academic training and intellectuals familiar with Tibetan and Han culture. The project was completed in six months and subsequently distributed to schools across various border areas.

In assembling the set, the compilers appear to hav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mong Tibetan students. As for content development, compilers guided Tibetan students toward establishing and nurturing a political, na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with modern China. Compilation of the textbook was undertaken by considering Tibetan students' teachability and learnability, therefore, the principle of compiling from simple to complex and easy to difficult was followed. Additionally, the anthologists incorporated many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is set of textbooks to reflect the local character of the Tibetan areas. The compilers also understood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tinctions. For example, they did not refer to heroes who emerged from internal strife in Chinese history as national heroes, but only those who emerg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fending modern China from foreign enemies. Despite the compilation of *General Knowledge* containing many commendable features, there are arguably several shortcomings, including the inaccuracy of some Tibetan-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the incoherence of some narratives.

Anthologizing border school texts wa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project for the Kuomintang to continu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which was supported by senior official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Data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u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most likely can help Tibetan students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modern China and the Chinese nation unconsciously. However, its impact should not be overestimated.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is identifica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versions. Furthermore, records tell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limited control over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refore, promoting education in these areas was quite challenging. The limited number of schools and the small number of student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ffected the printing and use of bilingual textbooks, resulting in the printing of only 2,000 sets of the first half of *General Knowledge* for use in schools of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Kuomintang's defeat in the civil war two years later, the set also ceased to be used, and Tibetan society did not benefit from it in a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ed manner.

Key Words: bilingual textbooks for ethnic minorities; the Tibetans;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dentity